

# 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黄晓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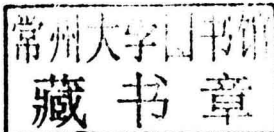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  
范式创新研究”(批准号 17ZDA112)阶段性成果

# 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黄晓春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 黄晓春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 - 7 - 5671 - 3092 - 0

I. ①技… II. ①黄… III. ①城市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0475 号

责任编辑 邹西礼 封面设计 柯国富

## 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黄晓春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 - 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7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1 - 3092 - 0/F · 175 定价 38.00 元

# 目 录

## 引言 理解信息革命——驱动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力量 / 1

### 第一编：技术治理的运行机理

#### ——一个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 第一章 城市社会治理转型与技术治理兴起 / 21

##### 第一节 新时期城市社会治理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 22

##### 第二节 城市社会技术治理的主要领域及深层挑战 / 30

##### 第三节 回归一种总体性理论视角 / 40

#### 第二章 技术治理的实现方式与运行机制 / 43

##### 第一节 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组织运作——理论溯源 / 46

##### 第二节 聚焦互动机制：新分析思路的发展 / 58

##### 第三节 本书的分析框架 / 69

##### 第四节 理解技术治理的复杂后果 / 72

#### 第三章 技术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76

##### 第一节 治理转型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 77

##### 第二节 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环境 / 86

第三节 技术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 / 100

**第二编：技术治理的实践方式研究**

——以基层政府的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

**第四章 作为新技术相对面的既有治理结构 / 111**

第一节 聚焦城市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组织安排 / 111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两面性：在开放与封闭间徘徊 / 124

小结与讨论：在科层与网络之间——既有结构的  
长程运动 / 138

**第五章 技术方案定型：治理结构型塑技术选择 / 140**

第一节 一门式服务中心的初期架构及对新技术之  
期望 / 141

第二节 三种待选技术方案 / 148

第三节 制度是如何思维的？ / 159

小结与讨论：从制度偏好看技术选择 / 162

**第六章 技术扎根：现有结构的“虚拟”再造 / 165**

第一节 现有结构的虚拟再造 / 165

第二节 制度匹配与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181

小结与讨论：新技术扎根的深层基础 / 188

**第七章 刚性的呈现：技术作为结构的一面 / 190**

第一节 新技术的刚性“外显”与组织运行 / 190

第二节 理解技术治理的效率基础 / 200

### 第三编：技术治理与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缩影

#### 第八章 公共管理多元参与的网格化治理实践：以 B 镇为例 / 206

第一节 B 镇的网格化治理实践与改革尝试 / 207

第二节 社会领域资源配置机制的模式与网格化  
实践的张力 / 216

第三节 小结与启示 / 219

#### 第九章 转型中的网络问政问效：以 N 市 Z 区为案例 / 221

第一节 网络问政问效的缘起与基本经验 / 223

第二节 网络问政问效平台运行遭遇的深层挑战 / 232

第三节 改革的选择与困境 / 238

#### 第十章 “社区通”的实践与制度内涵：以 S 市 B 区为例 / 241

第一节 “社区通”技术治理实践的方式与成效 / 241

第二节 “社区通”技术平台的制度内涵与启示 / 248

#### 结语 技术治理及其超越 / 250

第一节 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源起与  
表现形式 / 251

第二节 新视域下的治理转型及其深层问题 / 256

第三节 超越技术治理的基本思考 / 262

#### 主要参考文献 / 265

## 引言

# 理解信息革命——驱动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力量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在过去 40 年间经历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在治理机制上逐步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变，<sup>①</sup>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呈现了多样化态势，<sup>②</sup>在政府运行机制上更侧重于“行政发包”<sup>③</sup>与“项目治国”<sup>④</sup>。面对这种巨变，人们开始从多个维度回顾过去 40 年的改革历程：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治理转型？这种转型又带来了哪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学界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制度变革释放的发展空间（比如单位制的解体带来的变化）、经济转型的社会后果、社会的发育以及随之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等领域。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则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这并不是说，目前研究缺少对社会治理领域信息化及其社会后果的勾勒，而是说多数研究仍限于现象层面的描述以及“应然”层次的设想，缺少对信息技术嵌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机制与过程进行理论剖析与“深描”。

---

①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②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

③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

④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1995年1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分别在北京、上海开通64K专线,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步入信息时代——尽管当时的网民数量有限。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sup>①</sup>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ICT)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政府治理、商业运营等多个领域,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一次快速的信息革命。然而,至今为止人们仍很少从整体上来认识和理解这次革命对中国社会变迁和治理转型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已有的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信息技术对沟通交往方式的影响、对生活方式变革的推动、对社会动员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更倾向于把这次信息革命视为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而缺乏对两者间复杂的相互嵌入机制和因果机理的分析。

本书主要聚焦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技术手段和技术思维推动治理创新的复杂过程与机制。引言部分将在分析当前中国信息革命特质的基础上聚焦三个核心问题:信息技术对中国社会联结机制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力量与机制成长的推动以及它对中国政府转型的深深刻意蕴。这些初步的讨论将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新技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深层问题。

—

信息技术( ICT)是一种通用技术( GPT),能带来经济与

---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17-08-03)[2018-03-07].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bzg/hlwjtjb/201708/t20170803\\_69444.htm](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bzg/hlwjtjb/201708/t20170803_69444.htm).

社会运行的根本性重构。不同于增量式的技术进步(技术变革幅度较小并可以预期),通用技术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它所带来的技术是技术发展里程碑式的跳跃。<sup>①</sup> 信息技术不同于制造技术或生产技术——尽管当代大多数制度理论和组织研究在提及“技术”的时候,指的是后者。相比而言,信息技术灵活开放得多,它更加容易被拆分,而且允许无数的设计和使用。“工业技术是肌力,而信息技术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工业技术取代的是胳膊、手和肌肉,而信息技术替换的是传播、思考和计算”。<sup>②</sup> 信息技术革命至少和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物质基础的不连续模式。罗森伯格(Rosenberg)曾对此做了精辟描绘:“新信息技术不仅是个单纯的应用工具,而是有待发展的过程,使用者与操作者变成同一群人。因此,使用者能够控制技术,就像在互联网上一样。因而创造与操纵符号的社会过程,和生产与分配财富及服务的能力之间,便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元素。”<sup>③</sup> 如果更为深入地探求这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特质,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特征:

特征之一是信息技术对距离、效率和存储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帮助社会成员或组织克服地理距离上的鸿沟,当信息被数字化和共享之后,地理距离对于信息流动而言变得不大重要了,这使得人们在远距离范围内进行远程合作、协同解决问

---

① 世界银行. 中国的信息革命: 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② 简·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 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③ 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题以及发展高凝聚力的组织能力变得可能。<sup>①</sup> 信息技术同时也提供了现代组织更为高效处理事务的现实路径: 电讯传播网络和因特网, 使官僚机构能将某些任务实行集中管理, 也可以将其他一些任务实行分权管理, 从而以更高的效率 and 更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事务。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 信息技术的运用还可以帮助公众更为快捷高效地与地方政府沟通。信息技术以共享数据库的方式提供了组织存储(包括收藏、组织和提取)的便捷路径, 共享数据库可以保持信息总是处于易提取和易处理的状态。

特征之二是信息技术自身暗含着一种网络化逻辑, 它有可能使运用该技术的系统在运作中呈现出网络特征。网络的形态似乎能够良好适应日趋复杂的互动。<sup>②</sup> 借助信息技术, 人们现在可以在各种类型的组织(市场组织或政府组织之间)运作过程中, 建立更加扁平化、更加多线性的沟通机制——这些都使信息流通和组织沟通的成本大为下降。再者,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 各种电信、互联网络日益扩张, 这使各种类型组织都产生了加入网络的欲望, 因为在此过程中, 身居网络的好处成倍增长——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在1973年提出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这个公式显示网络的价值会随着网络里节点数目的乘方而增加, 这个公式是  $V=n^{(n-1)}$ , 其中  $n$  代表网络中的节点数目。<sup>③</sup>

特征之三是信息技术有可能使不同群体、组织聚合为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在日益兴盛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 不仅许多特定的技术逐步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比如: 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

① Huber, George P.. The Nature and Design of Post-Industrial Organization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8): 928-951.

② Kelley, Maryellen R.. New Process Technology, Job Design, and Work Organization: A Contingency Model[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55(2): 191-208.

③ 同上。

甚至纳米技术),而且许多旨在提升组织整合度的新管理思路获得了可靠的支持。以美国为例,1993年美国政府在时任副总统戈尔的倡导下,建立了“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Committee,简称NPR),该委员会提出了《创造一个花费更少、运转更好的政府》,其核心思路是打造一个高度协同、效率更优的政府体系;<sup>①</sup>而紧随其后的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依托则是信息技术的运用——NPR提出要“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通过技术手段整合政府服务,使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更为高效和快捷。<sup>②</sup>

特征之四是信息技术在被运用于特定组织或社群时,提供了一种解决各种核心问题的空前弹性。信息技术的这一特质很少获得研究者的关注,但其对于社会变迁恰恰最富革命意蕴。信息技术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层面重组结构的能力,这在以不断变化和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一种决定性的特征。<sup>③</sup>它有可能翻转规则却不破坏组织,因为组织的物质基础可以重新设定与调整。<sup>④</sup>这实际上意味着,革新的推动者可能运用信息技术在不改变既有组织及其根本运行架构的基础上,悄然地改变其具体运作规则——这种“静悄悄”的革命却有可能取得整体上体制革命所取得的相近效力。现代信息技术的这一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体制”与“机制”层次的改革变得“边界不清”,亦使得“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之间界限模糊。这意味着,改革者可以在尽可能

① 大多数介绍美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著作都会强调这个时期改革的特点是:把市场化理念引进政府。其实这一时期的改革还暗含着通过整合、优化政府体系,打造效率政府的取向。

② 参 见 冯惠玲主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③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④ 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控制对既有治理架构的深层调整从而控制变革风险的同时,通过运用新技术得到相近的治理成效。本书后继讨论将进一步指出,信息技术的这一特征为当前日益兴盛的技术治理思维提供了重要支撑。

具有上述结构性特质的信息技术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得到快速应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几年来以 2—3 倍于 GDP 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时间比西方至少晚了一个世纪的话,那么中国当前正遭遇的信息革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则近得多。由于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因此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与西方相比,最大的差异并非在技术水平上,而是在应用的方式以及和既有经济社会结构的结合机制上。

## 二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互联网和手机网络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并使传统交往形式得到拓展。许多人曾感叹:随着网络的发展,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互联网已经以一股汹涌的气势将世界连接在一起。然而若认真检视信息技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主要的变化可能还不是其引发的生活方式巨变,而是其对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社会联结机制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又隐蔽地扩散到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整合等重要领域,进而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也对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某种方式说,社会的延续建立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之上,而社

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有两种基本形式：“强纽带”(strong tie)与“弱纽带”(weak tie)。一般认为,强纽带在影响社会凝聚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弱纽带倾向于形成桥梁,将个体连接到另外的社会圈子,<sup>①</sup>它在以低成本供应信息和开启机会上相当有用。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的社会学研究在讨论“社会何以可能”以及“社会整合”这些宏大理论问题时,大多都是在“强纽带”意义上展开分析的。<sup>②</sup>弱纽带引起理论家注意的更多是它在个体层面投资性、工具性的运用。既有研究之所以很少在社会维系的层面关注弱纽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大规模、快速扩张、低成本、双向沟通的通信技术诞生之前,人们之间的弱纽带往往呈现为“点对点”的形态,而非一种发散性、多维互动的稳定网状,就运作而言它们常常处于不同的“时空情境”中,彼此之间缺乏共时性关联——这种被时空所分割的以“点对点”方式存续的弱纽带很难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起公共意见讨论、认同塑造以及社会动员的功能。<sup>③</sup>

而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微信、QQ、微博等)的发展不仅可以在规模上快速拓展现代人的弱纽带,<sup>④</sup>而且还重构了它的存续特征:(1)互联网内涵的先进技术逻辑,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使这些弱纽带以相对稳定的状态相互交织于一系列“电子社区”中;(2)由于互联网是“各种时态的混合而创造出的永恒空间”<sup>⑤</sup>,

①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② 比如: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讨论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之间强纽带的基础(建立在血缘上还是劳动分工上?),以及这些纽带形成的机制。

③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强纽带则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些社会目标。

④ 这一点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分析的那样:互联网等新技术特别适于发展多重的“弱纽带”,在他看来,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限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

⑤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因此不同时空中弱纽带所联结的问题可能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共时性的呈现,并由此引发关注、讨论甚至集体行动。这样,弱纽带借助互联网和先进通信技术就有可能在社会变迁中成为社会联结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互联网的发展至少在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弱纽带在社会转型与变迁中的作用,进而对社会联结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依托互联网,人们之间的弱纽带在规模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借助网络社区、微信朋友圈和各种“讨论小组”等方式,这些弱纽带又以多维交互网络的方式“扎根”虚拟空间,它们在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和意见表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许多网上交友俱乐部促进了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一些著名的讨论性论坛(比如天涯社区)为跨阶层的成员形成共同的归属感、产生相近的意义支持提供了渠道;一些知名网络社区还常常结合重大社会问题组织(跨阶层)成员公开讨论等。在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转型背景下,这些交流和意见表达对防止阶层之间相对“隔离”以及促进社会的整合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借助互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身处不同阶层、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和社会态度的人们可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结成松散的利益群体,并形成网络时代独特的多元利益抗衡机制。在互联网普及以前,当人们需要以集体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时,往往需要借助(或建立)一定的现实组织(比如:代议性组织或利益集团)。由于这些组织的运作、维持本身需要一定成本,因此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往往和利益相关者的凝聚力、集体行动能力以及成本分担机制有关,<sup>①</sup>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以组织化方式表达自身利

---

① 在奥尔森看来,成本分担机制问题甚至是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否成为可能的基础。

益的选择。当互联网和新型通信技术可以快速联结有着相近利益诉求的群体时,一种松散而低成本的组织化利益表达机制逐渐成型,它可以更为灵活方便地搭建集体利益表达的“虚拟平台”并将虚拟空间中的组织和现实活动嫁接起来。比如: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城市的大型社区中都出现了围绕小区维权的“网上动员”,这种利益表达方式与业委会的现实组织方式结合在一起,更为灵敏地反映了诉求。

这里要指出的是,通过互联网而形成的当代利益群体,是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种相对松散、更为灵活的社会成员临时组合,这种组合以及维持方式很难单纯地从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中被推论<sup>①</sup>,因而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随机安排性,对这类利益群体的有效协调与管理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上述两个分析维度展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社会联结和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给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带来许多新可能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和治理模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今天,我们也许很难在价值判断的层面对这些影响做出简单的评述,因为这些影响往往会与既有的社会结构间建立复杂的关联,并有可能被“灵活”地再建构。对于研究者而言,要对这些深刻的变化有更清晰的洞见,就需要超越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简单的、线性的以及形式层面的分析。

### 三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力量与机制的发育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面向。

---

<sup>①</sup> 这与阶级、阶层以及利益集团不同,它们都是宏观社会结构的某种产物。

学术界的分析曾先后涉及两个维度：最初“社会”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实体”，它是“不受国家支配的民间团体”，并且这些团体最终实现的是“社会自我协调”甚至“有效影响国家政策”的目标。<sup>①</sup>在这种视野的影响下，研究者更注意 NGO 的发展以及社区建设中的草根力量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新近的研究开始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层面来理解社会的形成路径，<sup>②</sup>因此开始关注现代社会运动在社会力量塑造中的作用。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它提供了人们表达自身意见、采取集体行动、影响公共政策的第三种重要路径。互联网以先进的即时通信技术、独特便捷的节奏催生和创造了一个没有强权和中心的、全新的、平等的信息空间，引起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一个人人都可能进入的网络自由流动区，网络技术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功能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公共领域的组织界限和特征，使传统的公众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当互联网把一个个松散的个体组织在一起、围绕公共问题展开讨论时，此时一个“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正在逐步成型。与借助实体化组织或社会运动而呈现的公民社会相比，“数字化虚拟公民社会”虽然显得“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样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政治上，它有利于对公共权力和政府行为进行约束与监督，避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在社会功能上，为公民提供互助的组织方式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在经济上，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的完

① 参见加拿大政治思想家泰勒对“civil society”的界定，见：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沈原在《社会的生产》（载《社会》杂志 2007 年第 2 期）中指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两种基本形式，“阵地战”与“运动战”，其中运动战就是依赖社会运动而实现。

善,有利于经济组织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是经济现代化驱动的综合动力之一;在文化上,有利于新型社会生活风格和公民精神的形成,对各种新的需求和机会做出迅速反应。

进入 2000 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例子进一步显现了这个“数字社会”对现代国家的影响。比如,标志性事件之一是:2003 年发生的孙志刚案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网友纷纷对相关涉案人的残忍表达愤慨,许多网友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已经走样的收容遣送制度。在网络所表达的强大民意推动下,有关涉案人员很快得到法律制裁,而网上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面对互联网和新技术发展产生的深层社会影响,领导层也迅速做出敏锐反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互联网是“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发展新疆域”“国家治理新领域”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习近平还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这块“新疆域”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互联网“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这些论述表明,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新技术,其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关系的新空间具有重要战略影响。

## 四

当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得到大规模快速应用时,中国政府同样也展现出了打造数字政府的高度积极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政府把 2002 年命名为“电子政务年”。其实,大约在比这更早的两年前,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